

东张西望

从他的书中，我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精英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反思，以及对实现中国未来富强的愿景。我希望木灰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国的观察和比较能带给读者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 申凤吉

迅速崛起的中国，其最需要和最缺失的东西是什么？也许人们对此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一代中国年轻人广阔的视野和深邃、成熟的思考。

——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

北京大学

わせだだいがく

HARVARD
UNIVERSITY

上架建议：文化·随笔

ISBN 978-7-212-05912-5



9 787212 059125 >

定价：26.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张西望 / 张暮辉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12-05912-5

I. ①东…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1247 号

东张西望

作 者 | 张暮辉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邢 楠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邢 楠

责任校对 | 邢 楠

责任印制 |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赵 旭

装帧设计 | 程 慧 王艾迪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5614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3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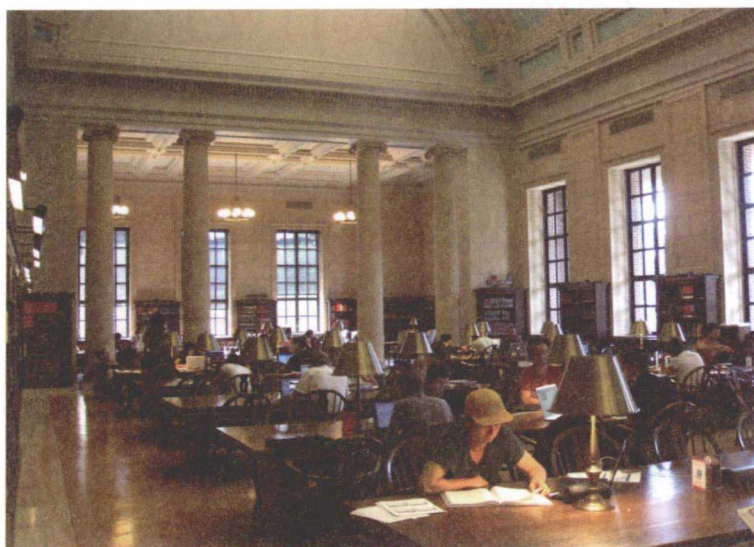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5912-5

定 价 |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冬天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大门两侧的石雕极具中国特色



哈佛图书馆内景



美丽的哈佛大学校园秋景

国家的年轻人，能够摒弃矛盾和偏见，在秘书处共同工作、互相交流和融合，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他们充满热忱、满怀创造力、愿意并善于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交流，对于三国合作的未来更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构想。我相信在秘书处的屋檐下，这些年轻人正在创造历史。中日韩合作的未来，将由他们谱写。

作为中国的“80后”一代，暮辉有着令同龄人羡慕的经历。未满30岁，就已经在日本、韩国、美国、香港等多个地方工作、学习和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对于异国文化多一份思考和研读，并将自己对不同国家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的观察和分析点滴记录下来，汇总成这本观察手记。或许是受益于他在媒体的工作经历，读者可以从文笔之中感受到他的敏锐，观察问题的角度独辟蹊径，批驳社会现象也更加一针见血。从学校生活，到社会文化，再到政治制度，由浅入深地铺开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对于一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笔人生财富的累积。

从他的书中，我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精英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反思，以及对实现中国未来富强的愿景。我希望暮辉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国的观察和比较能带给读者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同时我也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希望届时能够读到他对韩国社会的见解，以及对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规划和思考。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 申凤吉

中国的乞丐和美国的流浪汉 / 139

孔子学院的扩张发展 / 143

中国博士“吻瘫”了谁？ / 146

九、从“黄祸”到亚裔 / 149

华人的“洋名癖” / 149

人口普查和“公民意识” / 152

海外中国城透视（一）——走向衰落的唐人街 / 155

海外中国城透视（二）——中国城的分化和变迁 / 158

中国城透视（三）——夹在中美之间的“中国城” / 161

下篇 樱花林中、星条旗下——国际时政观察录 / 165

引 文 / 167

十、美日选举杂记 / 168

日本政治的死穴——魅力型统治缺失 / 168

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冷淡” / 171

日本的“愤青”政党——幸福实现党 / 173

“政权交代”后民主党的前景和困境 / 177

美国的选举热情——低投票率的尴尬 / 181

美国的选举热情——生活中的政治参与 / 184

选举战场：日本街头和美国大学讲坛 / 186

十一、亚洲人，亚洲事 / 189

“料亭政治”的前世今生 / 189

祸从口出的政客“失言” / 193

上 篇

从未名湖到查尔斯河——象牙塔中的修炼

引 文

《孟子》中有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后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略为改动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过“大师”自然可以让“大学”蓬荜生辉，然雅景怡情，雅韵养性，大学之灵气，总还是离不开山水景致的伴衬才是。

如北大之美，尽在未名一湖。未名湖之所以称“未名”，据说是来自钱穆先生的手笔。具体理由不得而知，或许是此情此景之惬合心意，“未可与之名”吧。

波士顿之美，半在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查尔斯河缓缓淌过这座并不算大的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把整座城市分为两半，一边是狭义上的 Boston（波士顿）市区，另一边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桥市。赶上温暖和煦的波士顿夏天，河上多可见划艇、帆船者，傍晚时分，河畔草坪上亦多见读书、慢跑者，落日余晖，闲庭信步优哉游哉。

同样被查尔斯河一分为二的还有著名的哈佛大学，河水从哈佛开放式校园的西南角穿流而过，留下哈佛商学院孤零零地与主校区分隔两岸，和主校区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隔河相望。同为哈佛，一河一桥之隔，却一属剑桥，一属波士顿，连邮政编码都不相同。

从未名湖到查尔斯河，常常忆起民国时期学术泰斗胡适之先生。先生任教北大而扬名海外，但他与哈佛的渊源世人却知之甚少。1937年，先生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印度化》演讲（*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语惊四座；1943年，先生辞任驻美大使，两度应邀到哈佛大学演讲并短期从事研究。

20 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 1909 年毕业，此后直到 1922 年，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共有 21 位。1928 年，在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从此，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直到 1945 年“二战”结束，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

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名人甚多，民国年间著名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中的两位——赵元任和陈寅恪，以及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都曾经先后就读哈佛，其中赵元任更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文科类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余早年的哈佛中国留学生还包括气象学家竺可桢、人类学家李济、文学家梁实秋等。

1936 年，时值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由胡适、陈岱孙等一批哈佛校友联名发起，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石碑，并特意不远万里跨越大洋送抵波士顿。于是这石碑也成了哈佛与中国百年缘分的最早见证。碑文如下：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系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兹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斯顿^①市，嗣在剑桥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大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馨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

西历一九三六年九月哈佛中国留学生全体同学敬立

① 波士顿的另一种中文译名——笔者注。

构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董事会，学社的财权也由该社董事会说了算。

今天的燕京学社，看起来简陋得很，办公地点只是一座有点像“工棚”的用轻型建筑材料搭建起来的二层小楼。学社没有研究人员，负责人虽然是在东亚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但燕京学社的日常工作是管理资金运作以及项目开展。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项目主要有访问学者、博士奖学金、博士培训以及资助书刊杂志的出版和发行。

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常年支持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运作和扩充。早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时，就建立了以“汉和”命名的图书馆，专门收藏中文和日文书籍。自1928年起，燕京学社逐年拨款购书，特别是收藏了大量的明清古籍，流传至今早已是价值连城。“汉和图书馆”于1965年改名为“燕京图书馆”，1976年并入哈佛学院图书馆（Harvard College Library），不专属燕京学社所有，不过其日常运营仍然由哈佛校方和燕京学社双方分担。

赫赫有名的燕京图书馆同样其貌不扬，坐落在神学街（Divinity Avenue）上，哈佛大学校内一条不大起眼的小路，总长度不超过500米。燕京图书馆外表看上去很不起眼，它只是一幢二层红砖小楼，在哈佛校园许多风格别致的建筑中显得再普通不过。燕京图书馆的入口就位于这栋两层小楼的中间，门脸宽不过两米，不过图书馆内部却是别有洞天。

在哈佛众多图书馆中，燕京图书馆大概是藏书密度最高的一个。图书馆共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上二、三层主要为日文书籍，地上一层是英文和中文书籍，地下一层最为壮观，除去部分韩文以及越南文书籍外，全部为中文书籍，且全部使用可高密度藏书的全自动书架。走廊左侧为现代中文书籍，右侧是古籍拓本等，可以说是燕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燕京图书馆外表并不恢宏壮观，进入图书馆后也甚感地方局促，但燕京图书馆名扬世界，是亚洲以外世界上最著名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之一。查得官方资料方知，到2010年时燕京图书馆共藏书92万册，每年增加约2万册左右，其中中文馆藏多达50万册，在全美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仅馆藏中文古籍一项就达到15万册之多，包括刻本、抄本、原版方志等。

燕京图书馆有一非常难得的景观，即有很多名人手迹。比如进门即可

学位的是以下两个项目——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LC，简称东亚系）和地域研究——东亚项目（Regional Studies of East Asia Program）。

之所以如此庞杂烦琐，是因为东亚研究乃是以地域划分研究范围，但有关东亚地区的研究又可以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多门学科，因此在专业划分上难免和上述这些一级学科重复。所以哈佛大学的做法是实行双轨制度，与东亚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学科（Social Science）以及部分人文类学科（Human Art），比如人类学、历史学等，通通划归这些具体院系管辖。具体打个比方，如果想到哈佛大学攻读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政治的博士学位，不应该申请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LC），而应该分别申请经济系和政府系。EALC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经常会提到的“哈佛东亚系”，但实际上这是个比较笼统模糊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虽然名字里带有东亚二字，EALC的专业划分是纯人文类专业，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类院系不同，其下主要包含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四个方向。有趣的是，仅以历史学科为例，EALC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之间还有更细致的分工：EALC负责研究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史，而历史系则主攻清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EALC与其他哈佛社科人文类院系一样，只固定招收博士学生，而不开设硕士课程，每年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在10～20人。

至于RSEA，基本可以理解为EALC项目的硕士教学版本，但又不尽相同。RSEA项目始建于1946年，旨在为对东亚地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较为浅显的知识储备。RSEA并非正式的“院系”建制（Department），而仅仅是一个学术项目（Program）而已。之所以说RSEA的地位比较特殊，是因为在哈佛校内通常是学术类院系只授予博士学位，只有职业类学院（比如商学院、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才授予硕士学位，而RSEA却相反，既授予硕士学位，又是非职业类学院。按照RSEA官方的说法，该专业的设置既服务于今后有兴趣从事与东亚地区相关职业的学生，同时也为未来立志于学术道路的学生提供攻读博士学位前的“热身”。

所以，灵活性才是RSEA项目最大的优势。虽然RSEA并非正式“院系”，但是RSEA项目和哈佛各院系之间存在协议，RSEA学生可以自由到任何院系内选修与东亚地区相关的课程并计入学分。各个院系内部大部分从事东亚地区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都被邀请加入项目的指导教师组（RSEA

等，其组织方式和费正清中心旗下与中国相关的学术活动大同小异。

至于主讲人，大概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由哈佛大学专任教授主讲，或是汇报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其二是邀请外来人士讲座，特别是结合当下热点议题，多为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圈内人士，旨在披露更多政府内部的观点意见；其三，也是讲座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由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或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来主讲，同时由相关领域的哈佛专职教授做讲座主持。

听讲座者也是相当踊跃，尤其是赶上热门题目的时候，提前十分钟、二十分钟占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不少报告人是久负盛名的学者、老教授，自然听众是趋之若鹜。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就有幸聆听过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先生的发言。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高龄，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中出任阁僚，并曾担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已经退休多年。我在本科读书时差不多都是在学习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如今亲眼得见，自然倍感荣幸。

不论是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还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一切学术活动，在官网上都有及时的活动通知，同时，在哈佛校园内燕京图书馆、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心、燕京学社等“东亚研究指定活动地点”处都会及时贴出海报宣传，让你随时了解学术活动信息。当然，最方便的一点是学生可以在网络上登记加入这些学术机构的 Mailing List（邮件通讯录），之后在每次活动前几天就会收到这些机构发出的自动群发邮件，作为活动通知提醒。总之，在哈佛大学的两年，听了许许多多顶尖学者及政府官员的讲座，真是大开眼界。

三十年之“怪现象”

莫要说高校里的学术研究可以如象牙塔般的“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便是如哈佛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学术研究的热点也经常是随时局而变，不免“相时而动”。这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中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的此消彼长中就可以看出究竟。

堆商科类专业的现象。商科类专业出身的人自然而然习惯从财经的角度看问题，社科类出身的人则习惯从人文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赴美留学生学科结构失衡，特别是商科类人才过度膨胀、人文社科类人才的相对匮乏，正在潜移默化地造成这样一种格局：有着海外学习工作经验的未来中国精英们看待美国、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多采用纯粹化、单一化的从“经济利益”角度。

“唯经济论”和“亲美”之间有什么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便知。在哈佛读书时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这样的氛围——“中美关系的根本就是一个‘钱’字”。2010年年初美国重新启动对台军售时，哈佛的中国学生会也曾办过几场类似的讲座、座谈，邀请国内军事院校的访问学者来讲对台军售和中美军事关系，座谈中就有不少在席的学生提出过以上观点。“经贸至上”还可以派生出不少在笔者看来是“荒诞”的推论，其中的典型莫过于“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失去全球霸权”、“中国GDP世界第二标志着中美可以平起平坐”等。在笔者看来，用类似“经贸至上”的思维来囊括一切中美之间的外交议题，进而看待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将遭遇到的一系列考验，这或许是一个危险信号。

中国精英“重商主义化”的隐忧

在“重商主义”者的眼中，中美两国经济链条的互动、经贸关系的加深才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和决定性因素，进而推广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也会滋生出这样一种心态：“美国视中国为朋友，而非竞争对手”；“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正在并且永远将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甚至乐观到“中美共治世界”。这也正是笔者所谓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新型亲美化倾向”的雏形和源头。说得宏观一些，这当然牵扯对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形势的判断，如果仅仅从“经济利益至上”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显然会比现实情况乐观了太多。

而之所以说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中这样的“唯经济论”思维是一个“危险信号”，首当其冲的就在于中美年轻精英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具体地说，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本身就过度弥漫着商业气氛，高校中商科类专业的火爆程度远远超出国外的平均水平，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在商科类专业的集

道扬镳。政治立场相左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华民国学生会”和“台湾同学会”这样的组织层面，也深入到个人的交际范畴。在不少场合下，蓝营学生难以融入绿营学生的交际圈子，绿营学生也很难与蓝营学生合得来。

“和而不同”的两岸关系

台湾学生内部因为“蓝绿之争”尚且如此分庭抗礼，哈佛校园内的两岸关系究竟热度几许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哈佛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在各个专业院系的分布情况颇为类似，具体来说就是理工类专业较为集中，社会人文科学类学生较少。一般来说在很多院系都会同时有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就读，因此相互接触的机会并不少，即使是互相再不信任、再排斥，也会处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局面，彼此之间的适度交往还是少不了的。

于是哈佛校园内的两岸关系总是会呈现出这样一幅怪现状：一个大陆人和一个台湾人同行，或许还可以有说有笑；三个大陆人和三个台湾人同行，就几乎已经是互不理睬。也就是说，个体的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倒还芥蒂有限，但是如果扩大到组织、团体的层次，诸如学生会这样的平台，两大组织则是形同陌路，没有任何交集，互相视而不见，更不要说大陆、台湾两边的学生会合作举办活动了。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台湾学生对大陆学生的恐惧、反感和不信任。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近年来，大陆留学生身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幅上升，这一点在海外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相比于大陆学生日益积极主动地希望与台湾学生接触和交流，台湾学生仍然表现出对大陆学生“与生俱来”的抗拒和排斥。

这一点在上面提到过的沙龙活动中就明显地反映出来。沙龙活动的发起人是一位香港教授，他本人在台海问题上立场较为中立，同时沙龙讨论议题又或多或少与台湾有关。但即使如此，在一个参与者以大陆学生为主的群体里想吸收几个台湾学生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位教授还是凭借他和台湾学生会的良好关系做了多次争取，劝说台湾学生应该珍惜机会多与大陆学生交流，这才促成了有限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活动，而且来参与的台湾学生一则寥寥有限，二则悉数为难营人士。不管你多么苦口婆心，只要活动本身与内地有交集，绿营学生都是断然拒绝接触交往，这也多多少少反映

彼此之间构筑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试想二三十年之后，如今的年轻一代精英成长为国家领导人或决策者的时候，这种“长期投资”便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么说来，这个项目其实扮演着“日本亲美政治家训练营”的角色，哈佛校园中的“日美同盟”在源源不断地为国际关系事务中的“日美同盟”的双方输送亲日派和亲美派政治家。

所以说，虽然哈佛大学的中国、韩国留学生数量远胜日本人，但是由于日本人普遍具有相当的工作经验或政府、媒体、跨国公司背景，相比中韩两国精英，日本精英显然对于国际事务和东亚局势有着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强的行动力。

人脉传承“前仆后继”

混迹哈佛东亚系两年，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哈佛校园中的日本人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似乎要比中国人之间更为通畅和发达。更“诡异”的是，校园里的“日美关系”，即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交往层次要胜过校园里的“中美关系”。而这种现象却又恰恰与中日两国人的英语水平成反比——中国人的英文交流能力普遍高于日本人。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团体中普遍存在的同僚传承传统。

日本人的数量总归是不能和中国人相提并论的，但是由于其大多供职于政府或公司各部门，因而影响力和活动能力却更胜一筹。这其中的秘诀是日本人前后辈之间的提携和传承关系。日本财务省和外务省几乎每年都会外派人员到哈佛东亚系进修，而日本最大的媒体《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也同样会派遣正式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到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研修。日本人的习惯做法是，前辈有责任“提携”后辈并尽可能将自己的交际网络和个人关系介绍给后辈。如此一来，虽然系里日本政府的派遣生们刚来到美国，往往也是“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但总是很快就能“找到组织”，搭建起稳定的交流渠道和人脉关系。

“留学生外交”——亲美疏华

哈佛的日本留学生、访问学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亲美派”，对中国普遍并不太友好。整体来说，校园里的“中日关系”比起“中美关系”和“中

韩关系”来要逊色不少。当然，年龄层次的差别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交往的一道隔阂，而更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政治立场。简单说，就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戒心重重，进而迁延到中国人身上，对中国人也缺乏好感度和信任感。

如果说得更“玄乎”一些，在中美日三方博弈的大背景下，哈佛校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未来几十年后这种三方博弈的一座风向标。今天，中美日三国年轻精英在校园内的交往姿态或许就影响着几十年后三国政治关系的走向。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哈佛的日本精英都“脱亚入美”的话，很难想象未来的日本会真正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转向中国。

遗憾的是，与日本政府内部业已形成的、稳定而前后承继的“亲美派”相比，哈佛的中国学生在这种“长期投资”方面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现有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Harvard 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成员绝大部分为学生，还没有能力担负起这种“长期投资”的重任。这样说来，日本人的“留学生外交”和利用哈佛大学的社会资源打造培养亲美派的思路，的确是一步用意深远的“高招”。

用意深远的访问学者策略

哈佛大学官方公布的数据上说，在籍中国留学生数量在四百人上下。不过这还只是正式具有学籍身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实际生活、学习于校园内的中国人远远不止于此——访问学者构成了又一路“华人大军”，不仅覆盖几乎所有的哈佛院系，其活动能量和积极性更是不输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上升，从宏观策略上来说，美国人渴望更多的与中国各行各业精英人士的接触、了解和磨合机会。美国政界如此、商界如此、学术界亦是如此，更何况哈佛大学本来就是美国各界精英人士“鱼龙混杂”之地。但无奈，哈佛作为美国大学之佼佼者、引领者，常年来恪守“精英教育”原则，无论是学生申请入哈佛学习，或是教职人员申请入哈佛任教，都向来秉持极为苛刻的标准，断然不会发生如中国高校风行一时的“扩招”现象。定额有限，校方又急切加强和中国的交流，于是短期的访问学者便

为数不少，其中或是通过校际交流，或是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问学者项目获得资助来哈佛，当然有不少是以私人形式递交申请。去向方面，除了各个院系都招收访问学者之外，中国访问学者主要集中在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来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心的中国访问学者每年大概有10～20人，前面在介绍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心时已经交代不少，在肯尼迪学院的中国访问学者要相对复杂些，访问学者的“层次”也参差不齐。

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简称肯尼迪学院，本就是一个“半学半政”的地方，各国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人士云集，研究不偏学术而偏政策，旨在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与哈佛商学院一样，人脉关系的搭建永远是肯尼迪学院的主题之一，小可以为个人计，中可以为学院本身的声名计，大更可以为国家外交计，这也是哈佛创建这个学院的深层次宗旨之一。在前面介绍哈佛东亚研究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托尼·赛奇教授执掌下的Ash中心几乎被中国访问学者所垄断，中国学者的数量大概在20～30人，除去中国人之外，大概只有少数日本和韩国访问学者在这里办公，以至于有戏称Ash中心已经变成中国人的“地盘”。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不管是Ash中心，还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旗下其他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或项目，都有意招揽中国官员赴哈佛访问、进修。由于他们的官员身份，自然而然也就居于“访问学者”群体中的塔尖位置，为人处事的作风派头自然与一般的学生学者们有所不同，所以也不难“鉴别”，这大概也是哈佛华人群体中的一大独特景观。

之所以决定单独选取中国访问学者这样的角度，是因为近年来哈佛校园内的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访问学者人数增多，覆盖领域扩大，访问学者的派遣、申请和安排工作形成系统连贯性。无疑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崛起宏观语境下，世界各国对中国由排斥到交往，由漠视到关注的心态变化。

形势发展固然可喜，却并非没有缺憾。访问学者制度的兴盛本是双赢：如前所述，小可以为个人计，访问学者本人也多有利用哈佛的光环头衔发表文章，扬名立万者；中可以为哈佛之声名计，哈佛在中国的名望，借由访问学者们的流动循环自然也“香飘万里”。但如果能够将访问学者的资源应用到国家决策层面，在提高官员的政策水平及实际工作经验的同时，

成为中美两国精英人士的信息交换渠道，并为两国的决策圈搭建人脉，那才是访问学者制度架构的终极路向。

话虽玄妙，理却通俗。肯尼迪学院已经开了为中国官员培训进修项目的先例，名为“培训进修”，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搭建和中国官员的交流平台才是真意。当然，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错的思路，借助这样的平台，派遣、培养更多的“知美派”总归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以日为师——日本的长期访问学者策略

在访问学者方面，不吝惜夸赞之词地说，邻国日本的做法才称得上是“明智而有远见”。

依托于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而建立的“美日关系研究项目”就是访问学者运作模式的一个经典之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的日本人数远远少于中国人，但活动能量、社会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中国人的秘诀所在。如果把中国访问学者的运行模式、结构与日本相比的话，会发现中美之间“访问”的层次和深度与日美之间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其一，中国访问学者中虽有一些官员存在，但“学者”身份者尚居大多数，由此可见中美两国之间的磨合磋商在某些领域还仅限于学者提出概念和学术论证的阶段。再看日本一方，从“美日关系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履历中就不难看出究竟：政界、媒体、财界、企业界，甚至连日本核事故后“名声大震”的著名日本官商典范——东京电力公司都会选派自己的访问学者赴哈佛研究日本能源政策。笔者在哈佛期间甚至还见过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司令官香田洋二，按官阶他是仅次于海上幕僚长的日本海军二号人物，他是以赖肖尔中心访问学者的身份于2009年到哈佛大学进修的。这也就不难想见日美两国在政治决策和具体合作领域上的密切程度。

其二，中国访问学者往往以个人身份申请，虽有个别的来自校际交流，但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哈佛校方之间并不存在访问学者的长期选派和培养协议，由此，中国访问学者虽人数众多，覆盖领域亦日趋广阔，但连续性不足，远未形成固定体系。日本的做法则不同，如财务省、外务省、经产省这些政府衙门，东电那样的大型官商企业，再加上直接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媒体大亨们常年选派研究人员赴美访问，可以保障日方机构和美国高